

引子



我的学术道路

一、童年的启蒙

我于 1926 年农历 10 月 19 日出生在福建省永泰县山西区（即现在的大洋镇）的一个山村小学教师家庭里。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道德、文章是教育的两大课题。学文章就是要学习明事理、辨是非、斟酌辞句、布局文章之类。学习方法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强调从书本中吸取养分。对我比较有影响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著作。不但从中学历史事实，而且要研究对事件的不同评价和写历史的演变。例如《春秋》原本是各国史官的编年纪事，忠于事实，不能加上自己的观点。《左传》则是左丘明根据各国编年纪事加以引申再做出评价，目的在于“正名分，寓褒贬、警后世”多少有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意思。到了《史记》则是司马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愿望，选择人物来编写传记体通史，历史著作的可塑性就更大。后来《东莱博议》甚至对同一史实做出与《左传》完全相反的评价。读这类书有助于锻炼思维，明辨是非。第二类是经典析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有不同的哲学思维，不同的主张，即使同一家学说，也有多种注解，或前后可能存在相左之处，这些都提供思考的源泉。例如孔子在《论语》中有一句名言：“毋友不如己者”。学者质疑谓：人不如己，我不与人为友，己不如人，人亦不与我为友，岂非天下无朋友？我读了父亲在《毋友不如己者辨》一文中，辨析道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孔子毋友不如己的用意应该是不要学朋友的短处，而要学朋友的长处，这样交朋友，岂不相得益彰，读者信服。又如《孟子》写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者质疑谓：对老百姓只可要他们怎么样做，不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不是愚民政策，和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相矛盾吗？父亲辨析说：根据孟子重民轻君的思想，孟子这句话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国民认可的事，就使他们去干，而国民未认可的事，就应该先使

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解释与原来的析义大相径庭，但前后一脉相承，自然合理。像这样例子还有不少。第三类是文学著作。例如《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对这类文章强调背诵强记。似乎作者意境胜处，只能神会，不可言传，惟有反复咀嚼才能吸取精华，领略神韵。从不求甚解到豁然贯通，重类比不重语法，也许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特色。

我上的中学是基督教教会学校。教会办学，引进一套西方教育制度，有比较严格的校规，特别注重英语学习，外籍老师强调原著精读，有一点类似中国学古文强调熟读背诵，心领神会。初中阶段学些简单的语法，高中阶段开始学《作文与修辞学》和世界名著。天天都有英语课，而且今天教明天考，不许积压功课。到了毕业班，班级同学已经可以演出英语话剧。

我的中学阶段正处于全面抗日战争，学校流连迁徙，生活动荡不安。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的残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地方盗匪的猖獗，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虽然我仍在学习阶段，谈不上学术观点，但现实促使我萌发一个思想：国运维艰，必须严律令，重刑罚、开杀戒，来治理国家。我在高中时写过一篇文章《刑乱国用重典》，除正面论述严刑与治乱的关系，并直数历代中兴帝王重刑律励精图治的例子。老师对文章的评语是“侃侃而谈，可谓杰作”，并在全班同学中传阅。后来我在班级《晓钟》墙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原乱》，阐述人类天性都赋有一种冲动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能被压制，只能加以引导。引导得对，就像火车在轨道上往前冲，推动社会前进。如果引导不好，这个冲动的力量，就会到处散发，形成社会动乱的根源。这大概算是我最初的法治观念吧！

1946年7月我高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升学有困难。所以毕业后就回家，决意找工作。奔走了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就业机会。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只好又到福州报考大学。在十天中我连续报考三所大学。最早发表的是福建学院，我以第一名的资格被工商管理系录取。但它是私立学校，我交不起学费。第二个发表的是福建师专（即现在的福建师范大学），我以第二名的资格被英语系录取。我认为师专全部公费，可以上师专。但不久厦门大学也发表了。我以第三名的资格被经济学系录取（事后我知道第一名未到校）。我被告知，根据我的成绩，可以获得全公费奖学金，就这样我进了厦大，我的学术道路跨入了新的阶段。

二、学术的成长

科学的道路是崎岖的，尤其社会科学的道路更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科学

高深无止境，要攀登它的顶峰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更因为它是战斗的、批判的，摆在面前的道路须依靠自己去判断去选择，更需要有向往直前的勇气。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当全国人民通过八年浴血抗战，取得艰难胜利的历史时期，但中国人民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也没能过着和平的日子。随即拉开解放战争的帷幕，全国人民又一次面临着历史的抉择。在国民党的白色统治下，学习、传播马列主义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经济学。

厦大当时被誉为“东南的民主堡垒”。有大批思想进步、学术威望很高的教授到厦大执教，如经济系的王亚南、郭大力、石兆索、王守礼、袁镇岳，历史系的熊德基，中文系的洪琛，教育系的杨东莼等等。这些知名的教授在学术民主的口号下，传播马列主义知识，他们不但在课堂授课，而且经常举办大型学术讲座，都非常受欢迎。使我跨进大学就有机会接触马列主义思想，并立志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当时经济学课程主要是学习以《资本论》为中心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读物有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前苏联卢森贝《‘资本论’注释》（三卷）、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王学文《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三卷）等。但我喜爱的还是王亚南著作，例如《经济论丛》、《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资本论’研究》等书，因为这些著作不但理论讲得透彻，而且着力于将理论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读起来更加亲切，受启发。郭大力开设《资本论》英文原版课程，他治学严谨奋发的精神，使人肃然起敬。他靠勤奋自学，23岁就开始翻译《资本论》。并为此作准备，先期与王亚南合译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在上海出版时，他才26岁，轰动我国经济学界。1938年《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他不过33岁。随后他又独自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通信集》、《剩余价值理论》等巨著。1949年他离开厦大，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任教，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厦大成为“东南的民主堡垒”不但表现在“讲坛”上，而且表现在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上。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师生中进步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也同样是很激烈的。进步力量用多种形式团结广大同学，出版墙报对国内形势展开讨论，并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组织各类社团活动，如歌咏队、绘画社、读书会、球队等等，政治气氛相当活跃。把广大同学带动起来。由地下党发动和领导的许多政治活动，罢课、请愿、示威游行、义卖宣传等如声援于子三惨案、声援沈崇

事件、反内战反饥饿、反对美帝扶日示威游行、平价米请愿、义卖救灾活动等等。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给我很大教育和鼓舞。如果说，厦大的民主学术风气，给我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那么厦大的学潮运动则使我认识群众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共产党在挽救和掌握中国之命运的核心作用。

在国民党白色统治“，职业学生”盯梢的情况下，王亚南在讲课时称马克思为卡尔，称列宁为伊里其等，以集体经济暗指社会主义经济，以个体经济暗指资本主义经济。1947年王亚南（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在经济系举办暑期论文竞赛，题目大意是根据世界潮流，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走集体经济道路还是要走个体经济道路。我当时才一年级，在比赛论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重矛盾，以及世界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趋势，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论文获比赛第四名，由王亚南奖励给我他的新作《中国经济原论》。第二年《星岛日报》发表国民党在广西开展土地改革的方案。我针对这个方案写文章指出：广西方案只规定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没有触及地主阶级的利益，更不可能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其次，广西方案不是发动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既无革命对象，又无革命动力，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方案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迷魂汤。以后的事实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也充分说明经济学的知识不但来自书本，而且来自实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深认识，获得检验。

1950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报考厦大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并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经济研究所就是当年由王亚南创办，任命胡体乾为所长，所以我也就是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继续师从王亚南研究经济学。主要研究课题有：

（一）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研究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但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解却是有所分歧的，它影响到这个原则的应用，工资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按劳分配从传统的理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按劳动者对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个人的生活消费资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食。这样理解按劳分配，可以和劳动价值理论联系起来，因为按劳分配归根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依据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这意味着劳动消耗多（按平均的劳动数量、质量标准衡量），就应该分配更多的剩余产品，使得不至于发生无偿劳动或不劳而获的情况。

但是付出劳动多，即使全部是有效劳动，不存在无效劳动，它的效果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相同的劳动量可以有不同的贡献，有时这些贡献差别可能很大，既然按劳分配原则应该体现“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的精神，则按劳分配原则，不应该是付出的劳动量，而应该是由劳动而获得的劳动成果，这就意味着社会总产品除了扣除生产消耗、扩大生产和社会必要消费外，还要扣除无效价值部分，然后作为生活消费资料按劳动者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样理解按劳分配既可以和不劳动不得食原则联系起来，也可以和劳动的社会效果联系起来，更符合社会主义实际。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工资制度》对按劳分配的理论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后《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香港《经济导报》1952年2期）《对按劳分配的几点理解》（《中国经济问题》1967年7-8期）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

（二）对经济效果理论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经济学要着重经济基础的研究，生产力经济的研究和技术经济的研究，经济效果问题就是一项实际亟待研究的课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王亚南就意识到这一点，并鼓励我开展经济效果理论问题的研究。于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我首先提出经济效果的基础是人们的劳动消耗与有用成果的比较，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范畴，它和其他一切经济范畴一样，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依一定历史条件而产生，又依不同社会形态而发生着性质的变化。一个社会范围内能不能存在经济效果范畴，其充分必要条件：一是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有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当然这个经济目标是可量的。从而对活动结果有一个比较标准。二是不同经济活动之间可以自由转移，自由支配。这样才使经济主体对经济效果的比较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经济效果范畴最初是以资本主义利润形态出现的。资产阶级追求最大的经济效果等同于追求最大得利润。这种经济效果是被扭曲不完善得，因为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劳动资源消耗中的有偿部分，而把大量资源践踏和工人失业算在自己的资本节约帐上。另一方面有用成果又表现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家所精心经营的私人经济效果又被社会所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生产目的，使得经济效果范畴的内涵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这里追求的经济效果是超越某些私人利益的社会效果。而且在满足一定社会消费结构前提下寻求经济效果最大化，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国民收入

或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等等。我的论文《投资效果的经济范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社会性质问题》(《经济研究》1964年第4期)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其次,经济效果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的研究。经济效果好坏可以从多方面的工作成绩中表现出来。例如投资效果的要求可以用“投资少、见效快、经营省、效率高”加以概括。相应就有投资节约效果、时间效果、降低经营费用效果、综合经济效果等效果指标来反映。而且每分项指标又可以由许多子指标来反映。如何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来相对准确地反映经济效果的各个侧面,以及如何分析这些指标,就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由《测定投资效果的统计指标》(《学术论坛》1957年创刊号)、《论投资效果指标的設置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2-3期)、《投资经济效果指标设计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理论版1962年1月22日)、《关于投资经济效果分析方法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论国民经济产量、固定资产和投资额增长速度的联系》(《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投资效果的比较分析》(《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4期)等等。

1981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第1期发表论文《投资效果的经济模型》一文。1982年应国家统计局的邀请到北京,先后在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统计局作此论文的专题报告,其讲话稿被印发全国作为业务学习的参考资料,修正稿由中国统计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编的《经济计划、管理、预测、决策的现代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一书全文收录这篇论文。1987年我与国家建委投资经济研究所合作承担国家经济学科重点科研项目《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研究》其研究成果《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性质与特点》由《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 关于生产范围和国民核算的理论研究

1972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我国收到联合国编送的各国国民生产总值资料,对比我国所用的总产值指标有很大差异。国家统计局委托厦门大学研究东西方社会产值指标的比较。我参加这项工作完成三件事,编写《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的计算方法》参加厦门市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核算工作试点并写《总结报告》。提出《关于最终产值的统计问题》报告向国家领导机关建议在我国推行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制度。这个建议不仅牵涉到我国统计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存在经济理论的再认识问题。所以引起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普遍关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重蹈早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斯密教条”

错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在中国统计学会首届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作《略论最终产品与最终产值》报告，指出最终产品是社会生产中本期提供消费和本期不再加工的产品。从使用角度考察，可以分为居民消费品，社会消费品，投资产品，净出口产品等项。从价值角度考察：它等于全社会的非公司企业收入、租金、利息、工资薪金、公司利润、资本损耗补偿（折旧）、企业间接税务等项总和。也等于社会各企业产品增加值的总和。所以最终产值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一个国家（地区、部门）生产的规模。社会总产值是社会各企业产值总和，包含着加工原材料的重复计算，受企业组织机构变动的影响，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生产规模。（《略论最终产品与最终产值》一文发表于《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6期）。争论的另一焦点是国民生产总值应该不应该包括属于劳务性质的第三产业的活动价值，实质上是对生产领域范围的争论。这个争论曾蔓延到全国，历时多年，形成窄派、中派、宽派等不同见解。我的研究成果曾在第三届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作《第三产业统计的理论问题》，报告在《中国经济问题》1988年第3期上发表。并在国家统计局第二届全国统计论文评比中获得统计科学论文优秀成果一等奖。在该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三产业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生产技术发展，许多服务于生产过程的新部门新行业逐渐从传统的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如信息、通讯、航运、软件开发、咨询服务、建筑设计以及金融、证券、保险、租赁等等。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消费的数量、质量都不断提出新需求，如理发、美容、旅游、音乐、电视广播、体育、医疗、环保以及教育、新闻等等。由于非物质的家庭消费比重增加，促使生活服务社会化、家务劳动社会化。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行业很快发展起来。不能简单地将非物质生产等同于非生产。精神产品也有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特殊的积累形式，把服务行业作为非生产行业是不科学的。历史也证明第三产业不但客观存在，而且愈来愈重要。为了扩大宣传这一观点，我们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立中国化的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1983年7月18日）一文。而今国民生产总值理论已被全国各界所共识，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已在我国推广应用，方法制度不断完善。回顾自己参加这个历程，作过努力促进改革，堪可记载。

（四）关于数量经济学的研究

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研究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1980年6月至8月我参加接待以美国L·克莱因教授为首，有T·安德生教授、A·安藤教授、邹至庄教授、肖政教授、栗庆雄教授等来华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班。并倡议发起组织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至今我还是该学会的顾问。

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不仅要进行它的定性分析，还要开展定量分析，通过经济模型，揭露事物的数量关系，有助于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刻化、具体化、精确化。数量经济学是结合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的边缘交叉学科，也是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工具。在西方国家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先后译校国外有关著作，将波兰奥·兰格《经济计量学导论》、日本佐和隆光《数量经济分析基础》、日本山根太郎《统计学》英国 J·W·S 卡塞尔《数理经济学导论》等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在北京计量经济研究班结束以后，我发表《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中国经济问题》1981 年第 6 期）《经济计量学简介》（人民日报 1981 年 3 月）等。

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数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我先后承担国家部委级、省级数量经济研究课题，计有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应用计量经济学》、国家建设部项目《中国建筑业投入产出分析》、厦门计划委员会《厦门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厦门特区社会总供需宏观调节模型》、《厦门市技术进步数量分析及其对策》、以及参加《管理科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会议》的论文《投资优化模型的理论和经验分析》等等。

三、统计学科建设

1950 年厦门大学创办统计系。当时王亚南校长的办学思想是：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必须熟悉财经各行的具体业务。于是首先创办统计、会计、企业管理、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等系。再建立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胡体乾教授兼任统计系主任，我在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统计系辅佐系主任建系和教学工作。

我的统计学学习得益于经济学的功底，更得益于数学知识。参加工作以后我就到数学系师从著名数学家方德植教授学欣钦的《数学分析》斯密尔斯的《高等数学》、张鸣镛教授学《实变函数》等课程、李文清教授为我们组织学习小组，学习 H Cramer《统计数学方法》逐章轮流作报告 每次李文清教授都亲临指导，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们很大帮助。我又在统计系多年担任《高等数学》和《统计数学》课程 为以后研究《统计学》打好基础。

我先后承担的统计理论与方法课程，包括《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统计学》、《统计学原理》、《抽样调查专题》、《统计预测专题》、《工业统计》、《基本建设

统计》、《经济统计》等。统计著作主要有：《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统计学》（四川人民出版社）《统计学原理》（中国统计出版社）《统计学原理问题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应用抽样方法》（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统计学》（中国统计出版社）等二十多本。多次获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优秀著作奖励。主要历程简述如下：

打倒“四人帮”，全国人民努力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接受国家教委组织领导的编写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的任务，于1980年8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高等学校文科统编的统计教材。该书至1987年2月连续印刷11次，总发行量超过50万册，1988年1月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89年5月《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增订本）出版，统计学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至1995年连续印刷7次，总发行量超过11万册。1992年1月获得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统计教材奖（不分等级）。

经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计统系于1982年开始招收统计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数量经济学三个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我为统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统计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从筹建、担任硕士统计理论与方法课、指导硕士毕业论文已20多年，担任博士统计理论专题课程、指导博士毕业论文也已十多年。从2001年开始指导博士后流动站的进站研究员。前后为国家培养大批高级经济管理人才。

1987年通过高等学校层层推荐筛选，最终经国家教委评定，厦门大学计统系统计学专业为国家唯一的国家级统计学的重点学科。2001年第二次学科评选，厦大计统系蝉联国家级统计学的重点学科荣誉。充分肯定了厦大计统系在教学、科研、学术梯队、学科建设的成就。我一直是统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致力于多项教学改革。由我主持的《建设统计学科体系》项目获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根据1987年国家教委财经教育会议精神，对财经类高等学校教育提出“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的要求制定十门财经类核心课程，作为所有财经类各专业共用必修课。其中《统计学》经过投标评比，确定由厦门大学计统系承担。我是主编，该书试图将传统的统计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和社会经济基本指标、国民核算结合起来，主要提供给非统计专业的财经类各专业使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每年发行供全国使用，于今已经十个年头，2001年出版修订本，总发行量已达到13万册。

1988 年在国家统计局组织领导下，成立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由我担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历两届达 10 年之久。教材编审委员会推动教学改革，讨论教学计划，确定统计专业的主干课程，并制订教材编写规划，组织力量进行编写，按计划完成规划教材的编写任务。另一方面组织统计教材的质量评估和推荐，以及优秀教材评奖，使教材质量的提高和改革创新有了制度上的保证。由我担任主编的高等院校统计学专业规划教材《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于 1996 年 1 月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各高校作为统计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广泛采用。1997 年国家教委向全国高等学校发出通知推荐该书作为经济、管理类各专业通用教材，并要求各高等学校应该尽量选用国家教委推荐的或得到社会公认的水平较高的教材，作为今后评价教学成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同年，国家教委将《统计学原理》列入“九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编写计划，仍由我担任主编，重新组织编写，作为我国跨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国家重点教材《统计学原理》于 2000 年 6 月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并于 2001 年获得国家统计局颁发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统计教材奖（不分等级）。

我担任属于成人高等教育的中央电大经济、管理类统计课程已经有很久的历史，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先后为中央电大讲授《统计学原理》和《抽样调查》两门课。其中我主编的《统计学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三个版本总发行量超过 220 万册。《统计学原理》（修订本）于 1999 年获得国家统计局颁发的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统计教材奖（不分等级）。

此外还配套出版《统计学原理问题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统计学原理例题分析》（中国展望出版社）、《统计学原理解题指南》（中国统计出版社）等等。这样由我主编的有关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材总发行量超过 300 万册。覆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计专业和财经类非统计专业，以及成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历时二十多年，至今鼎盛不衰。这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和相关领导对我的肯定。

如果说统计教材建设是统计学科建设的核心，那么统计科学研究则是统计教材建设的基础。事实上，统计教材正是我国统计改革进程和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表现，我先后承担统计类研究项目计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研究》、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经济统计学专题研究》、《计量经济学专题研究》、国家统计局重大科研项目《多主题结合抽样与样本轮换问题研究》、福建省哲社基金项目《厦门经济特区总供需宏观调节模型》《厦门市技术进步数量分析及其对策》等等。发表统计论文数十篇。其中《统计理论基本问

题》、《第三产业的统计理论问题》分别获全国统计科学论文二等、一等奖。《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先后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中国统计体制的改革问题》应邀参加美国统计学会 1984 年年会讨论,并分别在香港《经济导论》和《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社会经济统计理论体系的思考》、《大学科统计刍议》被收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文库》中,《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计体系》一文则作为软科学成果被选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中。《转型中的中国企业统计模式探讨》被选入《‘统计研究’百期精品集》中。《中国农产量抽样调查的特点》、《非交通系统公路货物运输抽样方法调查》等论文多次被邀请参加中国加拿大联合举办的《管理教育项目学术年会》并获得优秀论文奖励。

统计学从它的渊源就是以不同观点的国家记述学、政治算术学、数学概率论走到一起。学术的争论延续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统计学科建设更是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西方统计学的发展掌握在资产阶级学者手里,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前苏联统计学者对西方统计学持否定的态度,早在 1938 年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社论《统计科学中暗害行为的后果》拉开对西方统计学全面批判的帷幕。一直持续到 1954 年以统计科学会议决议的形式,断定“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样把数理统计学排斥在统计大家庭之外,形成两门独立甚至对立的学科。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统计全盘接受苏联统计思想、理论指导,批判统计方法论,批判概率论基础。上纲上线,势不两立。结果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限制了自己的认识能力,影响着统计学科的发展,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认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论国家宏观调控或企业微观管理对统计都提出新的要求。我国统计工作面临着转轨问题,而统计理论则存在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统计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存在统计理论创新问题,如大学科统计理论建设,统计信息网络建设等等。由此可知,统计学科建设仍然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的研究主要课题有:

(一 关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学科性质

统计学的学科性质历来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科学,它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具体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而且对现象的定量研究是以定性研究为先导,最终归结为对客观事物性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另一派认为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它只提供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和分析问题的原理、原则的方法论,而不涉及客观对象的具体数量。统计方法既适用于生物、医药现象,也适用于社会、经济现象。统计学不研究客观现象规律性的具体表

现，而是研究大量具有随机性质现象的统计规律性。这两种不同认识是导致两门统计学对立的根源。

我认为这里存在着认识的不同层次问题。就一般统计理论而言，其中心思想是对大量随机现象的数据加以综合平均的结果，将使变量的个别影响相互抵消，而显现出它们共同作用的倾向，使总体数量特征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可以比较确切地反映现象的规律性和特点。社会经济现象也具有随机的性质，所以同样适用一般统计理论所提供的方法。我最早在 1980 年《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提出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随机的性质”，曾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有些表示赞同，但更多是责难，甚至认为是大逆不道邪说，企图以概率论代替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数理统计代替社会经济统计。这说明当时两门统计学的对立局面。针对这些情况，我在 1982 年全国第二届统计科学讨论上作《统计理论基本问题》的报告，详细说明社会经济现象随机性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共识。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理论统计学和应用统计学的关系。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应用统计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它根据社会经济现象的性质和研究的任务，确定适当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方法，以解决所需要研究的问题。这里研究对象是主体，统计方法服从于研究主体的需要。理论统计学帮助我们，通过偶然性达到发现必然性，认识现象规律的表现形态，但它并不能说明现象的本质。社会现象性质的认识必须以相应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理论基础。我在《资本论与统计科学的发展》一文研究了经济学作为统计学理论基础的意义。

统计学是方法论科学还是实质性科学也有认识层次问题。理论统计学由于是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适用于自然现象也适用于社会现象，因此是通用方法论科学。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出现是“国家显著事项”的记述，或国家政治国力的数量比较，人口出生、死亡的分析，研究客观现象的数量体关系和研究统计方法总是结合在一起，这种统计学必然是实质性的科学。只当统计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统计方法和经验，并且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思维从分析到综合，从演绎到归纳，特别是数学概率论引入统计学，研究统计方法为中心的现代统计学才能出现。现代统计学才是方法论的科学，它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统计对客观的认识能力。从历史发展来考察，社会经济统计学出现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现代统计学的形成不过约一百年。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理论体系

我提出这样的观点，统计理论及其体系不但要适应客观对象的性质，还要

适应主观认识的要求。如果说客观对象的内在联系是建立统计理论体系的基础,那么,这一科学是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是检验它有没有存在价值的前提。始终不变,处处完美的理论体系是不存在的。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产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统计理论体系的问题。

我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计体系》一文中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计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考虑系统外部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统计的需求,来确定各系统的目标,系统的功能和特征,系统的基本框架,以及系统运行的组织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计体系应该包括宏观调控统计体系、市场经济统计体系、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多主体、多层次、目标各异、功能互补的综合体。宏观调控统计体系是为了满足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信息、开展咨询、实行监督的需要。所以宏观调控系统的总体目标是监督调控,而不在于经营决策择优。市场经济的运作是建立在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上,经济当事人根据市场提供的供需信息,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作出符合各自利益的决策。因此市场经济的统计信息体系的目标在于经营决策择优,而不是监督调控。所有信息都是为了参与市场,占有市场,赢得市场,在一定的风险中取得最大的收益,或一定收益中采取最小风险的方案。社会保障系统旨在补救社会居民中由于非个人自愿或个人能力所及而引起经济损失的社会福利措施。因此社会保障信息系统的目标在于社会风险最小化,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国家总体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平稳健康的发展。

社会经济统计学既要运用国民核算的方法也要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应该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中心,多种调查方法结合应用。对比计划经济统计以报表为中心,就有很大的差别。统计学反映抽样调查为中心就要把抽样调查和推断摆在中心位置,并且从统计学基本范畴、数据搜集整理、以及数据分析各方面都要凸显抽样的概念和它的应用。这就是我在全国第三届统计科学讨论会上报告《社会经济统计理论体系的思考》以及以后编写的各类教学大纲和教材所贯穿的思想。

(三 关于建立大学科统计)

建立大学科统计的实质就是建立独立的、统一的、统计学科。这个问题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从渊源来说,由于长期把数理统计作为一门数学,把社会经济统计作为一门经济学,人为割裂统计学,造成许多消极后果,现在要

纠正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于是有人提出要恢复统计学的本来面目，有人提出统计学就是统计学，统计学不是数学，更不是经济学。那么统计学又是什么呢？其二，从事数理统计研究和教学的同志体会到数理统计不与社会经济结合就没有前途，想从西方走到东方。而从事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同样体会到社会经济统计应该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才能进一步提高统计认识能力，想从东方走到西方。于是产生是一门统计学还是两门统计学的问题。其三，实际统计工作部门的同志认识到统计不但要含盖社会经济现象，同时也要含盖科学技术现象。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科技统计指标体系都只是统计指标体系的一个子体系。我国的科学分类从 1992 年起将统计学与经济学并列为一级学科。因而大学科统计就成为现实需要研究的课题了。

有趣的是，四十多年前在苏联曾由科学院、教育部、统计局三方面专家召开统计科学大会，研究将统计学分为两门科学，而四十多年后在中国也由社科院、国家教委和国家统计局三方面专家召开会议研究将两门统计学合二而一的问题。这也显示我们的历史责任。我在西安召开的《建设大学科统计讨论会》上所作《大学科统计刍议》报告中提出了以下认识：

1. 大学科统计的基础。

能够把各类统计学归纳到统计学大家庭内必须有其共同的基础。大学科统计的基础在于研究对象特点的共同性和研究方法的统一性。不论自然现象或是社会现象，作为统计研究对象的现象都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因而认识这些现象只能依靠调查、观察、描述、归纳、分析和判断等方法 其中包括数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可以说，统计学就是一门认识不确定随机现象规律性的方法论科学。社会经济现象也同样具有随机性，我们承认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社会经济统计学数量分析的重要方法，这和坚持社会经济统计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没有矛盾的，正如生物统计学、物理统计学也必须以生物学和物理学为理论基础一样。加强大学科统计建设有利于统计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各类统计方法的交流和推广应用，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2. 大学科统计的分科。

统计学就其学科性质来看，它是一门认识方法科学，和数学、哲学、信息学、语言学等等同属于综合学科。但现行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把所有的学科归为五类 即自然科学类、农业科学类、医药科学类、工程与技术科学类、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并没有综合科学类。对于综合科学视其主导地位决定其归属，例如

将数学、信息学归为自然科学，将哲学、语言学归为人文社会科学等。统计学是不是属于综合科学尚有不同认识，即使属于综合科学，其归属应是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社会科学更难加以确定。现行统计学的分类又是一分为二的做法，将数理统计与应用统计数学归入数学的二级学科，而将其余部分归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后一个一级学科。这种分类的科学依据何在，尚需研究。统计学就其内容来看，确实横跨几个学科，包括数学、哲学、信息学等等。也可以算是交叉学科。我国现行科学分类对于交叉学科是将其列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例如管理学、环境科学、安全科学就列入两类科学之间，实际上是作为工程与技术类最末学科来分类的。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绝大部分统计学家从事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少部分从事工程技术统计学研究，从事纯理论统计学研究的很少，把统计学作为交叉学科，与管理学并列为一级学科可能更切合我国实际情况，也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大学科统计除了一级学科分类外，还要考虑二级、三级学科分类问题。统计学还处于新兴阶段，其分支学科都还未成熟，所以目前二级、三级分科宜粗不宜细。例如二级分科可以列理论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统计史学、其他统计科学等等。

3. 统计学的纵向分科和横向分科。

统计学的纵向分科指把统计学当作统一学科然后按内容顺序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等等，表明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反映学科理论的深化和应用广度。统计学的横向分科指统计学按其应用范围分成各类专业统计学。

专业统计学是以该部门的专业理论为基础，设置专业统计体系，采用适当统计方法，解决该学科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专业统计学是统计学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同时也是该专业学科的一个成员。经济统计学是统计学科中应用统计的二级学科，也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科学分类中同时加以反映。这样分类安排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提高统计学科地位，团结更多更大的统计科学队伍，发展统计科学；二是有利于各科研教学单位根据各自研究性质和方向选择自己的学科归属，鼓励多方位、多门类地发展统计学。

四、投资学的研究

我研究投资学有很长的历史，经历了若干阶段。早在 1952 年我国刚建立基本建设投资报表制度，厦大统计系主任胡体乾教授一天拿着一叠国家统计局